

【编者按】马克思的文学理论并不构成其思想体系的一个孤立部分，因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谈及文学的片言只语中去拼贴他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有点舍近求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已包含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主要体现于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不是一些文学分析技巧。自俄国形式主义者和韦勒克相继提出“文学性”和“文学的内部研究”之后，此前在要求“专业的明晰性”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有一种身份模糊感的一些文学研究者，似乎终于在康德的“美的无关功利性”中找到了自己的明晰的领地，那就是“文学文本”，而其代价，则是将整个世界及其历史关闭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可是，既然每一个作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复杂关系之中进行写作，那么，将他的作品从这个特定历史语境的复杂关系之中剥离出来，就像是史前的地层中发掘出一个孤立的物品，你甚至无法判断它是否是艺术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智性生命力，在于它总是努力提供一种总体化的视野。在我们的历史感知方式日益“碎片化”的当今，重建这种总体性视野显得尤其迫切。本期本栏两篇论文（《制造“真正的”差异：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和《史实呈现与历史关系的重建——以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史研究为例》）均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的发展入手，探讨“文本性是远远不够的”，并期待着这么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深知权力和政治问题不仅关乎语言和文本性，而且直接联系着表意实践。”

制造“真正的”差异： 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

徐 德 林

内容提要 拉克劳和墨菲所建构的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激进理论立场，它始终以一种不可还原的解构主义视角看待社会、历史、文化、主体性以及一切知识和政治范畴，而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则旨在通过跨学科式介入揭示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素有扬弃和挪用各种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理论资源的传

统。面对“激进的文化变迁”的挑战，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选择了与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以期制造一种“真正的”差异。本文以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旨趣为起点，探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之道，阐释后马克思主义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涵，证明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比其他实践更为重要的实践。

关键词 后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接合 领导权 “真正的”差异

序 言

在一次关于如何进行文化研究的访谈中，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把自己比作喜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都抓到自己的窝里”^①，形象地道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在理论挪用上所秉持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策略与开放性。纵观其历史，从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CCCS 或者 CCCS）成立之前的形成时期，到“中心”的成立及其在1987年演变为文化研究系的经典时期，再到1980年代末至今的全球播散时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确已把多种理论资源“抓到自己的窝里”，其中既有纯然本土的文化主义，更有穿越英吉利海峡接踵而来的欧陆理论，比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霸权理论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些被“霍尔们”“抓到自己的窝里”的理论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理论，无不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色；其次，对这些理论的运用，“霍尔们”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使用，而是基于“情势”（conjuncture）加以挪用。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雷蒙·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与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等发轫性著作或者霍尔的《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与理查德·约翰逊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等纲领性论文所证明的那样^②，英国文化研究的践行者们始终保持着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各

^① 金惠敏《积极受众论：从霍尔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② See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Legac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Paul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277-29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Richard Johnso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s, 1996, pp. 75-114.

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始终致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因此，不但保证了文化研究在一片抗议声中取得了其学科合法性，更促成了文化研究通过“后学”转向实现全球播散。所以，无论是追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过去，还是窥望文化研究的未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关系，无疑是文化研究践行者的一种必须。

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一如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后马克思主义同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谱系：作为一种直接联系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激进理论立场，“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形成于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中”^①，尤其是他们1985年发表的名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后简称《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②。虽然经历了从1970年代作为一种“思潮”或者“运动”到1980年代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的演变，后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依然是“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种理论”^③，人们对何谓后马克思主义、谁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等问题，往往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虽然拉克劳和墨菲曾经说过，“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标签，它仅仅边缘性地显现出来（并不作为一个标签）”^④，但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⑤，拉克劳和墨菲一直享有“后马克思主义鼻祖”、“后马克思主义思想首领”、“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等美誉，不但被视为最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几乎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关于拉克劳和墨菲何以能够技压群雄，学界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即他们曾开先河地宣称：“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

①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详见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金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对“hegemony”一词的中译，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译为“领导权”，有人建议译为“霸权”，笔者鉴于该著作中译本的被接受度，在本文中选择了“领导权”的译法（引语除外）。

③ 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④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第二版序言》（《领》：4）。

⑤ 1958年，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便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中使用了作为一个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1973年，丹尼尔·贝尔为了论述他之前（1959年）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观，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不但提出了“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概念，而且从社会学的视野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阐发（详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第34-88页）。

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可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如果本书的认识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领》：4）评论家保罗·雷诺兹也说道：“正是因为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墨菲的著作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①

然而，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能够“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绝对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自称后马克思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解构为特色、以介入为核心的理论本身。我们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科学而显影的，其目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将以一种普遍的阶级革命斗争为高潮；但拉克劳和墨菲却通过对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考察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预测上还是在描述上都有重大失误，严重背离了其客观历史科学的主张。所以，“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领》：3-4）。首先被拉克劳和墨菲解构或者“祛魅”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总体性概念、激进革命概念，而这一起点的选择直接关乎他们“自己的过去”：作为曾经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拥趸，拉克劳和墨菲已然走过了漫长的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是那些通过它们阐明的新政治概念才得以可能的传统之一。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出发点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身的过去这一事实上”（《领》：4）。这意味着宣称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克劳和墨菲并无意放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而只是意欲抛弃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历史的“必然”发展中某些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概念，而代之以强调社会-政治组织的偶然性、被剥削被压迫者必须通过政治斗争而获得解放这一“新政治逻辑”，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详见《领》：48-49）。或借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拉克劳和墨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②。关于这一点，拉克劳和墨菲有过多次强调。在后马克思主义论争沸沸扬扬的1990年代初，拉克劳曾在一次访谈中辩护性地宣称：“我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已然解体，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

① Otd. in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e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 263.

②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p. 246.

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①而在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已然从激烈反应演变为平和探讨的二十一世纪初，拉克劳致信《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中译者时再次重申：

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十九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领》：4-5）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虽然解构意味着背离和决裂，但对某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不但不会导致他们处于“马克思主义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妨碍他们对激进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执著，而且唯有这样的解构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继续产生建构性的影响，比如在“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

如今，拉克劳和墨菲的这一旨趣已经引起诸多评论家的关注，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核心要素。正如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等所强调的那样，拉克劳和墨菲“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拯救它的某些方面，重新定位它们，使之在快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新的意义”（《后》：1）：

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方面（尤其是政党的控制）、一般总体化理论、对马克思的神化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体系的屈从。他们赞成多元主义、差异、对权威的怀疑、政治自发性以及新社会运动的事业。……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再试图弥合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理想的幻灭，尽管它对一种摆脱马克思主义正统束缚的政治未来可能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后》：4-5）

对西姆等批评家而言，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确乎没有“发明”后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提供的东西是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降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0, p. 85.

义和共产主义的零碎的、孤立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理论化”^①，因此能让我们把反对意见变成一种理论视野，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在背离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新近发展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当中，从而达成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二、后马克思主义与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拉克劳和墨菲曾“受惠”于多位理论家：普兰查斯、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等，但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则可谓是其间的关键性人物，“《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实质性观点取决于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解读”^②。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倘若没有葛兰西，他们是否依然能够成功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拉克劳动情地说道：

就“后马克思主义”而论，答案非常简单：不。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说它不能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不过，那将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你一定得想到：我们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脱出，我们才开始建立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维特根斯坦传统的对话。对于我们所喜爱的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是至关重要的……重新阐述、重新发挥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的作品的主旋律。^③

拉克劳之所以会在谈到葛兰西对其后马克思主义建构的贡献时情绪激动，是因为正是葛兰西，尤其是其“领导权”抑或“霸权”（hegemony）概念，促成了他本人与墨菲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解构与后马克思主义建构。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首先，早在1970年代中后期，拉克劳和墨菲就各自开始了他们对葛兰西思想的挖掘，并且基于葛兰西的“领导权”，成功型塑了有助于消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的“接合”概念（articulation，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

② Michèle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63.

③ 转引自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即意识形态要素借助话语聚合而建构领导权的方式)，因而有效地催生了后来对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多门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接合理论”^①；其次，随着曾经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失败，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陷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加之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等理论家基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得出了彻底自治的意识形态概念，拉克劳和墨菲在刺激下对葛兰西思想的态度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1年，他们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策略：下一步怎么办？》的长文，郑重宣告他们要“超越葛兰西”，“走向一种新的领导权概念”，将社会主义建基于“激进民主”的观念之上^②，于是正式开启了他们基于解构的后马克思主义建构之旅。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既然相同的社会主体经济地位未必能够保证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既然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追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里的“阶级”概念也就失效了；而且，即使“阶级”继续作为一个概念使用，也不会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宣称的那样由经济所单一决定。所以，为了完成其消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这一“第一要务”，拉克劳和墨菲拥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唯一把政治理解为接合实践的葛兰西；但又鉴于葛兰西思想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成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领》：156），宣称以基于后现代主义视野消除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为特征的“超越葛兰西”或“新的领导权概念”已然成为一种必须。

不过，在追求领导权接合充分自主化的同时，拉克劳和墨菲并未放弃建立意识形态统一性和政治认同的可能性。为此，他们挪用多种思想资源，型塑了一种“一切皆话语”的新话语理论作为“新的领导权概念”的理论支撑，并以之为观照，开始了他们的“新社会运动”考察：

“新社会运动”一词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它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性少数

^① 详见徐德林《接合：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39-161页。

^② See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y: Where Next?”, in *Marxism Today*, 1 (1981), pp. 21-22.

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与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有所区别。（《领》：177-178）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暗示的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不可根除但又不可或缺的“对抗”已然多元化，其结果是出现主体位置多样化、利益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强调那个成问题的阶级斗争概念是毫无意义的”（详见《领》：178）。这一认知把拉克劳和墨菲引向了他们的成功设计——“激进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就是对“激进民主”的承诺与建构，而“激进民主”则是承认社会主义主体的碎片化、分散性及多样性，“接合”各种反资本主义压迫的抵制和斗争形式，把民主推向所有政治领域、所有社会群体、所有生活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家指出，拉克劳和墨菲思想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价值”^①。

必须指出，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关注新社会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80年代中期以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挫折。著名新左派思想家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在谈及“反思”社会主义的理由时便说道：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它们天生带有对传统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对工人阶级成为激进社会变迁的主体的愈发严重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对英国而言更为具体的是，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还有“撒切尔主义”的创伤，以及更具创伤性的是，它具有选举获胜的能力。^②

所以，对新社会运动的关注有效地表征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后现代政治，有效地激活了后马克思主义对英国新左派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促成这一切的重要媒介之一便是“拉克劳-墨菲事件”。众所周知，《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①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58页。

^② Qtd. in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6, p. 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甫一出版便引起了褒贬鲜明的反响。葛兰西研究专家戴维·福加斯对之做出了“是的，但是”式解读：在赞许拉克劳和墨菲思想的创新性、呼吁人们关注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地位、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关系的“挑衅性”介入的同时，他表达了对他们思想的实践性的怀疑。虽然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改造的特权主体”的地位，但以平等的“复调的声音”“赶走”工人阶级无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核心出现真空，这就意味着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想法，但难以看出它如何变为现实”。^①

文化分析专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称赞拉克劳和墨菲通过把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批判政治化，明确解决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的问题，承认“他们的著作提供了抛弃过去的一切声誉扫地的遗产并重新开始的机会”^②，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多元主义等主张“仍然是一种连接的话语，虽然不是连接到任何现有政党或者政治意识形态”^③，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缺陷，而且可能摧毁社会主义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道德权威。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梅克辛斯·伍德则有条件地承认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似乎是对其时代的“完美全景勾画”、“拥有最佳的民主意图”，但同时又基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阶级之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认知，明确反对“退出阶级”（see *Retreat*: 47, 64, 12）。因此，伍德不但直言批评了拉克劳和墨菲强调话语因素为政治理论组织原则，“贯穿在拉克劳-墨菲论断中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谁将为话语的载体？谁将构成相关的文化身份？”（*Retreat*: 63），而且指出他们一如“新的‘真正’社会主义”那样，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相对于任何社会基础尤其是任何阶级基础的自主化”，染上了一种可能把马克思误判为目的决定论者的“智识疾患”：“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历史记录和结构性对抗，迥然有别于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对其所做的描述。那么，我们禁不住想去弄清楚，当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否认工人与社会主义之间甚至一般来说经济条件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的时候，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Retreat*: 186）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在收获认同或者同情式认同的同时，也遭到了很多评论家的敌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罗伯特·扬甚至拒绝把拉克劳和墨菲的马

① See David Forgacs, “Dethroning the Working Class”, in *Marxism Today*, 29 (1985), p. 43.

② Stanley Aronowitz, “Theor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in *Social Text*, 16 (1986/7), p. 16.

③ Stanley Aronowitz, “Theor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p. 3.

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后马克思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虽然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但它并没有变成‘后资本主义’（还可以补充一点，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崩溃了，但我们不能随即假定这是资本主义终结的信号）”^①。在这些批评者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诺曼·杰拉斯无疑最为尖锐。虽然杰拉斯非常坚持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倡的多元主义所暗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他眼中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显然是旨在借助“我们”和“他们”之分，表征一种不可还原的理论与现实二元论，抑或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告别：“在这个地方，除了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真的再也没有其他的救赎了。”^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尚未打算告别马克思主义的杰拉斯对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犀利的批评，说他们寻求的调整与其说是“后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前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抑或说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

马克思主义充满了各种问题和一些尚未解决的疑惑、空白、缺陷和研究不足。但是，那些把这作为放弃或者摧毁马克思主义的依据的人，给出的并不是理由，而是借口。因此，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一种思想的选择，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是一种道德选择。^③

面对各方批评，拉克劳和墨菲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回应。文中他们不但回击了杰拉斯等批评者完全没有注意到政治异议正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机会：“我们正生活……在二十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于其间新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历史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④，而且，也把他们的批评者作为民主革命的敌人归入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减少的追随者”^⑤这一阵营。另外，拉克劳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还原论性质发起挑战，质疑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观念：“我们显然并不是否认工人与企业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而是否认这些冲突产生于对雇佣劳动/资本关系的逻辑分析。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关系

① 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1, p. 7.

②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163 (1987), p. 58.

③ Norman Geras,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Essays o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6, p. xvi.

④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166 (1987), p. 80.

⑤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p. 81.

的理论基础是把具体的社会行动者归结为劳动力买方/卖方的经济范畴。”^①

这样一来，更多正统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到了“保卫马克思”的斗争之中，于是便出现了一场围绕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持续论争（详见《后》：19-73）。这一著名的“拉克劳-墨菲事件”虽然给拉克劳和墨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三、制造“真正的”差异

英国文化理论家保罗·鲍曼（Paul Bowman）指出，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原本有两种关键性的差别：“首先是在‘文化’问题上，文化研究对文化进行了解构，而后马克思主义几乎不提文化；其次是在‘政治’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而文化研究却有保留地接受了政治概念”^②；但最终，两者因为解构主义这一媒介走向了“接合”。具体地讲，虽然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对解构主义的认知和挪用不尽相同，但二者都认同如下观点：“解构不应当只是一种有助于巩固现有结构的方法论创新，也不应当成为其对面，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夸耀或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这些行为最可能的结果是使事物保持原样，并把大学中最保守的势力结合到一起。”^③借用霍尔的话来讲，二者都希望在解构之中“制造‘真正的’差异”（“Cultural”：286），并借此培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深知权力和政治问题不仅关乎语言和文本性，而且直接联系着表意实践；深知理论既是一种求真意志，更是一组被争夺的、在地化的、情势性的知识，一种旨在介入的实践；深知理解智识工作的政治有别于以智识工作代替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接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者都是具有政治内涵的体制性实践，都以介入社会-政治语境为旨归，都依赖“接合”和“领导权概念”，尽管二者又都无法确定应该如何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介入”：

①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 9.

② 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马》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Jacques Derrida,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in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p. 23.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作为研究方法，都起源于一种介入式的努力，它们也主要地把自身当作一种介入式的努力，试图挑战、清除或至少去发展既有的并且通常广义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政治因果关系模式、介入模式以及关于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事态、身份和对象的各种理论模式。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都力图构建那种富有成效、负责任、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在伦理-政治上严谨的介入。换句话说，二者都力图实现介入。……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都极大地仰赖“接合”(articulation)这一理论(宽泛地说是解构主义的)概念，同时也极大地仰赖“霸权”概念(同样，尤其是拉克劳和墨菲所阐述的霸权概念)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和描述的政治和文化的接合逻辑，以及意义、价值、关系、身份、取向和制度所赖以建立的活动和过程(《马》: 5)

然而，“制造‘真正的’差异”既是可能的，更是形势所迫：要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等“激进的文化变迁”的严峻挑战。二战以降后工业社会的转向后，1970年代至1990年代政治右翼势力在西欧和美国的崛起引发了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变迁”，“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后》: 8)，而且出现了一种新无产者，即安德烈·高兹所说的“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①，它是一个不曾出现在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图示之中的范畴。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工人阶级在后工业社会从阶级意识的衰退到普遍主体的消失，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切地体悟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危机”^②，纷纷追问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到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怎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甚至卢卡奇在总结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时候也都没有怀疑过工人阶级不是无产阶级，虽然他曾指出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淡漠了。被迫“告别工人阶级”的情势让左翼意识到了“借助一个团结起来的阶级的力量来解放全社会不再是理解或者预期社会变革的模式”^③，因而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霍尔在论述英国新左派的危机和复兴时指出：

①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Mike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 67.

②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 66.

③ Angela McRobbie,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49.

考虑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斗争这一概念本身：意识形态是战场，其他的所有斗争都与它利益攸关。因此，我要讨论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前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为社会主义思想赢得大部分民众——社会的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我之所以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思想和为社会主义赢得情感与智慧的斗争——的核心地位，是因为我一再受到这一方式的打击，借助它社会主义者依然认为社会主义不知何故是必然的，尽管它的到来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快：并不是完全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和热情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不过注定迟早会取得支配地位。……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或许我曾经认同过它，但我现在认为，倘若社会主义不是为我们所创造的，那么它就必定不是为我们而创造的，甚至不是历史法则为我们而创造的。^①

这里，霍尔代表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情绪，它直接联系着他基于苏联阵营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得出的社会主义不再拥有“任何绝对的保证”这一信条（see *Hard*: 179）。不过，一如促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在 1980 年代英国出现并被接受的那些文章^②所暗示的那样（详见《后》：15），霍尔虽然一再受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打击，但他坚信，只要英国左翼能够放弃每逢压力就“求助于我们所知道的信仰”（*Hard*: 271），不再偏爱“贫困但却纯洁的工人阶级：没有因为接触市场而受到污染的工人阶级”（*Hard*: 213），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霍尔认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从头再来”，英国左翼甚至有必要向已然成功“自然化”、“殖民化”大众的“撒切尔主义”学习，比如必须认识到市场支配的社会的吸引力：

消费资本主义通过让市场运转而运转……即使“人民的资本主义”没有解放人民，可它“解放了”很多人，让他们过上了一种相较于三四十年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更少、道德管制更少、限制没有那么严格的生活……因此，左翼从未理解市场在普通大众的心灵中的能力，市场不是被视

^① 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pp. 177 - 17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它们基本刊登在《今日马克思主义》（*Maxist Today*）、《新社会主义者》（*New Socialist*）、《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等刊物上。

为一个公正、体面、充满社会责任（它从未有过）的体系，而是被视为一个扩张性的大众化体系。（Hard: 215）

与此同时，英国左翼还应该认识到，“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对社会进行国家管理，这一看法不再能够站得住脚或尚可忍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一个临时过客。它是为长留此地而来的”（Hard: 231）。霍尔认为，社会的多元民主化与废除国家机器同等重要，民主并不是一个选举政治或立宪制度的形式问题，而是权力向无权者的真正转移。为此，无权者必须到社会的诸多场域、不同阵线去寻找他们可以借以掌握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方式，而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通过摧毁国家机器而一劳永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接受了葛兰西的“领导权不仅仅是为国家所构建，而且同时也是为市民社会的多个中心所构建”的思想。所以，有评论家指出，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能够在1980年代走出不列颠，对世界各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就在于霍尔经由葛兰西与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建设性相遇。霍尔在接受访谈时谈道：

话语理论要求我们以一种非整体论的、非统一性的方式思考重新引入、恢复主体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忽视拉克劳和墨菲关于政治主体之构成的发轫性工作，以及他们对政治主体性源于完整的自我这一概念的解构，这个自我也是完整的言说者，是言说行为的可靠主体。因此，话语隐喻具有特别丰富和广泛的政治影响。比如，它让文化理论家能够认识到，我们所谓的“自我”是由差异构成，是为差异所构成，并且充满着矛盾，同时也认识到，文化形式……从来不是完整的，从来不是完全封闭的或者“缝合的”。^①

话语隐喻直接关联对已有定论的问题或问题系的重新思考，因而可以刺激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重新思考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介入、责任等问题，所以，话语隐喻不但在霍尔眼里构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理论革命”，而且鼓励他宣称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因为它们是最我经常接触的两种

^①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45.

话语”，而反对一个接一个的时髦理论的没完没了、追新逐奇的循环。^①

霍尔的弟子安吉拉·麦克罗比曾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及其他著述中探寻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否存在“文化研究可以填补的缝隙，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②，这毫无疑问暗示了后马克思主义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并非完全没有局限性，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也并不否认后马克思主义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影响之巨大。正因为接受了拉克劳的观点，霍尔及其追随者们才获得了同等对待“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个‘神圣三位一体’的各个成员”的可能性。^③同样，正因为受拉克劳的“历史和社会都是无限的文本”这一观点的影响^④，霍尔在指出“文化总是通过其文本性发挥作用”的同时，还表示仅仅有“文本性是远远不够的”（“Cultural”：283），文化研究不应过分拘泥于拉克劳意义上的“能指的无限滑动”，而是应该既认同又抵制解构主义与文本性：

理论的重塑作为我们必须通过语言和文本性的各种隐喻去思考诸多文化问题的成果，表征了一种立场——现在，文化研究必须始终依据这个立场来定位自身。话语和文本性的隐喻具体地说明了一种必要的延宕，一种移位，我认为后者一直隐含在文化概念当中。如果你试图研究文化或其他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自己被赶回到了文化当中；如果文化恰巧成了占据你的灵魂的存在，你就必须认识到你永远都是在一个发生位移的领域上工作。文化媒介、语言、文本性和意指实践中总是存在去中心化的因素，总要直接而且立即地逃离和避免与其他结构进行联合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的型构、处于体制位置的各种文本的文本间性、作为权力之源的文本、作为再现和抵抗场所的文本性都留下了阴影、印记和踪迹，所有这些问题都绝不可能从文化研究当中被抹除掉。（“Cultural”：283 - 284）

正是鉴于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在1990年代，不乏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重要学者，纷纷撰文把后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帮助英国文化研究

① See Stuart Hall,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p. 149.

② Jeremy Gilbert, “A Certain Ethics of Openness: Radical Remocratic Cultural Studies”, in *Strategies: Journal of Theory, Culture & Politics*, 14: 2 (November, 2001), p. 191.

③ See Colin Sparks,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 92.

④ See Ernesto Laclau, “Populist Rupture and Discourse”, in *Screen Educations*, 34 (198), p. 87.

突破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桎梏的新的理论范式。不可否认，无论是霍尔事实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视文化研究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论的批判的思想），还是与之紧密相连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都已经被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完全吸收。^① 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家的一些著作，尤其是霍尔的著作，打开了一个被还原论遮蔽的空间和空白，而这一空间或空白的理论化，则倚重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著名的是阿尔都塞（他借鉴了葛兰西和马克思）、葛兰西（他借鉴了马克思），当然还有马克思。其主要设计师是拉克劳和霍尔。”^②

结 语

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陆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③，与经历了“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英国文化研究经由美国舶来中国的历史大致相当^④，但不无遗憾的是，虽然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能力，比如，国际文化研究学会（ACS）第12届双年会“文化研究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便于2018年8月在上海大学举办，但后马克思主义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而深刻的探究。其结果是，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基本完成“文化转向”的文学研究，在发展中都不期然间出现了智识努力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抑或说可以“制造‘真正的’差异”的批评实践的滞后，即一种德里达意义上的“责任”的失守。“今天，对于一个在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工作的人来说，最基本、最有趣、最具创新意义、最具责任感”的行为，就是“尽可能清晰地、主题鲜明地”表达出见诸各种阐述的“政治内涵”（详见《马》：1）。

^① See Jeremy Gilbert, “A Certain Ethics of Openness: Radical Democratic Cultural Studies”, in *Strategies: Journal of Theory, Culture & Politics*, 14: 2 (November, 2001), p. 189.

^② 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 117.

^③ 《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刊载了S. 朱罗维奇的文章《评〈人类的发展和社会〉》（文兵译，第59-62页），该文评述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思想家B. 朱尔杰夫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中对“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批评，认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王宏周等译），其中贝尔使用了当下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术语的“后马克思主义”。1993年11月，董世骏在中国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对作为一个术语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首次自觉挪用。

^④ 详见徐德林《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

“后”既是一种时间状态，也是人在时间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后马克思主义等“后学”既是一种与时间和理论斗争和内化的状态，也是理论的某种转型和对理论本身的再认识：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比其他实践更为重要的实践。这是我们面对当下情势必须具备的认知，它将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脱离现实的倾向，有助于学术活动介入实践寻找新的实践方向与动力：“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对什么负责？承担责任或者说负责任地、有意义地介入指什么？介入什么对象，又如何介入？”（《马》：4）新世纪初，《新左派评论》刊载了以《协商中的世界文学》为代表的多篇聚焦“世界文学”论争和阅读实践的文章，其作者们既没有放弃马克思的“元问题”，也没有抛弃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而是恰恰相反，挪用马克思继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探讨“世界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存在方式和可能性以及“世界文学”中的权力机制。^①

也就是说，在后马克思主义已扩展到文化研究，对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产生重要作用的当下，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一个“学术-政治责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固定的、直接的关系，而是紧张的冲突性关系，彼此间充满了分裂和矛盾，必须追问后马克思主义会要求文化研究选择什么方向、约定、目标和对象。毕竟，正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与世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者的未来部分地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言行。^②

[作者简介] 徐德林，男，1968年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论、文化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出版的译著有《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责任编辑：严蓓雯

^① 详见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赵文、秦晓伟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详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师从海登·怀特，曾与霍尔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共事，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是美国文化研究界的领军人物。